

走向海洋贸易带

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

陈东有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杨国桢 主编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海洋与
中国

丛书



走向海洋贸易带

——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

陈东有\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 洋
与
中 国
丛
书

海 洋
与
中 国

走向海洋贸易带

——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状

陈东有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 8512093 850431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恒达科贸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印刷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12.5印张 230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31.80元

ISBN 7-81033-865-X/k · 34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 1.8 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 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 6500 多个,5 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 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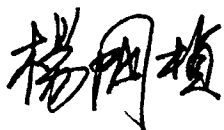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视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21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

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分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造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 21 世纪!



1998 年元旦

致读者

研究历史,是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复忆”历史,并且找出错误,总结教训。这是历史研究的主要重任,也是本书写作的第一出发点。

当然,研究历史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了历史,而且还是因为我们有今天,有未来。因此研究历史的动机之一还在于通过对历史的“还原”“复忆”,来为今天的我们和未来的后人提供更好地生活和更快地发展的借鉴,提供更有益更深刻的思想素材。比如我们曾痛心疾首地感慨我们的前人失去了许多富民强国的机遇,那么那些机遇是如何失去的?我们的前人为什么会失去本该属于我们的机遇?错误何在?教训何在?我们还深思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海上力量,为什么在我们的前人中间没有出现哥伦布?我们有数千年的商业历史,有相当成熟的商业文化,为什么我们的商人总是抬不起头来理直气壮地为谋利而经营?中华文明至少已有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社会维系和变迁的传统制度、习俗究竟是什么?而在近三五百年的世界巨变中,当那些后起的国家与民族凭依适时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先后跨进近代资本主义之时,为什么中国仍然徘徊在传统的道路上,不能跨进资本主义社会?

探讨这类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同

的角度和视野。多样性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丰富内涵。而从海洋看中国,可以得出与传统的从陆地看中国不同的结论与思考。

商人,当社会生产发展到由分工而产生交换时,就已经诞生了,后来交换的发展,只是促进他的行为成熟。市场,是以交换行为为主要活动的特别空间,我们习惯称商品交换的场所是市场,然而,这只是市场的物质表现;市场的实质内涵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通过商品交换体现出来的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之间的供需互利互动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¹

中国的商人与市场的萌生比较早,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进入16世纪,世界由于地理大发现,海洋经济活动空前频繁,进入到全球性以互利商贸和殖民掠夺并存、各种商人和市场都企图发展为特征的近代经济形成时期;而中国的国内进入了一个商品和市场都较为发展的时期,以海上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海洋社会经济也出现了新的发展:中国商人,特别是东南地区(包括今日的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江西、安徽七省)的商人参与以海洋联系为载体的、形成中外互动作用的近代世界市场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新的进步。直到19世纪中叶,历史才翻开了另一页。

对于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东南商人参与近代世界市场活动的这一段历史,多年来,已有不少

专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和研究成果。恕我孤陋寡闻,前辈学者的学术关怀,大体集中在商人与商业资本、市场、海外贸易和对外关系等方面。²据现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中国海外贸易有如下主要内容:

其一,中国对外海上贸易是发展的,并以合法的(朝贡贸易)和不合法的(民间走私贸易)两种形式进行着。“新航路发现后,西方国家商船东来,中国海外贸易跟着展开新的局面”,“由于海洋航运效率提高,中国海外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为过去中外贸易所望尘莫及”(全汉昇)。对于贸易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进步的现象”,但又存在不少弱点(傅衣凌);有学者认为是“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是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服务的”(张维华)。在发展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原本可以继续发展的中国帆船海外贸易由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才绞杀了中国远航帆船发展的前途”(田汝康)。

其二,由于中外贸易是发展的这一结论得到学者们的肯定,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至晚明,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张铨);有的则认为到鸦片战争前夕出现“中国原有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在近世初期扩大并与世界经济体系整合的繁复网络”(林满红);有的还认为,在“中国的世界市场扩大过程”中,英国银行资本通过“AB两种三角贸易”向中国渗透,整个渗透的主要过程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但是这种渗透的发端却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近百年

时期(滨下武志)。

其三,对于商人的研究,有的学者注重把商人,特别是海商作为海外贸易的行为主体进行研究(傅衣凌),更多的学者由于注重的是海外贸易或市场的研究,即经济史的研究,人——商人的研究往往是作为物——商品研究的附属,商人行为的研究不多,少量的研究往往是作为支持商品流通状况、数量研究的载体形式被纳入分析过程中的。

这样,在对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世界市场和有关商人的研究中,既取得了功不可没的丰硕成果,又还有很多工作须继续努力。比如:

其一,社会的商贸活动是以趋利为动机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同地区间的贸易活动一样,双方都以牟取自己所期望的利润为目的,因此,贸易双方实际上是一种因互利而互动,又因互动而互利的关系。我们不妨设问:中外贸易得以实现,不论其方式如何,是单方面的利益所驱,还是互利互动?中西贸易发生阻隔、冲突,是单方面的利害所致,还是互动过程中利害失去平衡所致?客观地研究中外贸易中的互利互动关系,是探讨明清时期中外海上贸易演变过程的重要内容。

其二,中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一统国家,再加上时间、空间的限制,中外海上贸易不可能对整个中国产生互动互利的影响,即使在东南地区也是分层次的。那么在贸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它的立体层次是怎样构成的呢?在那些与海外贸易发生较为频繁的交易地区,由于商品

结构和交通条件、社会条件的不同,又形成了怎样的交易网络,或曰贸易带的呢?具体地考察这种贸易层次和贸易带的实际是分析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与世界市场发生种种复杂关系的重要前提。

其三,商人是实现各种贸易的行为主体,一般的经济史可以不论及经济关系中的行为因素,也就可以不论及行为主体,但是研究社会经济史必须把对人的研究作为动机和目的,仅仅依靠并非确切和并非真正统计意义上的数字、贸易形式、商品结构的分析,并不能对人的经济活动作出合理的历史的解释。因此,讨论商人及其贸易行为特征和社会特征应该成为研究中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四,商人行为,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行为;中外贸易又是不同的集体之间的互动行为。悠久的商业历史、厚重的传统习俗、专制的政府同时控制着中国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行为,凝结在中外贸易中的许多问题往往是深层“制度”的结晶。明清时期中外贸易曲折发展的“之所以然”何在?“制度”与个人行为、集体行为的关系何在?

值得指出的是,有关研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学科课题研究条块分割造成的学术发展的局限,使“以往的成果多偏重于个人单项研究的进展,缺少多角度、全方位的整合,或陷于繁琐考证,或专注一个领域”³,没有把中外海上贸易中的经济活动、商人、市场纳入到更广的视野和更本质的层面中去考察和讨论。在过去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这种研究不仅造成薄弱环节并留下空白区域,而且有些研究对史实

采取一种断章取义为己所需的办法，以打碎历史去替代“复原”历史，以偏狭的政治实用去替代科学的学术研究。今日史学所需要的，是开阔考察史料的视野和敢于面对史料的勇气以及客观分析史料的科学精神。

二

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包涵了海洋民族的成分，海洋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传统，海洋人文是中国社会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海洋的力量源泉。”⁴“事实上，中国比西欧更早怀抱海洋，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⁵“从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划等号的旧观念摆脱出来，有助于解开长期以来困扰我们正视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诸种问题。”⁵

什么是海洋经济？什么是海洋社会？

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海洋经济与人类其他形式的经济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明清时期，它表现为五种海洋生计：海洋渔业、海水制盐、海洋交通（造船与海运）、海洋贸易和海洋移民。海洋社会，“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行为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组合，即与海洋经济互动的社会和文化组合”⁶。

中国有自己的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发展历史。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历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领域去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海洋有关的问题,不仅可以解决用内陆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观察海洋社会经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不仅可以更全面地去分析中国的问题,而且还会把我们带进到世界发展的更广阔视野去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在对待今天和明天的中国发展问题上,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全球的视野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对待昨天的中国发展史上,我们也应该从全球的视野来讨论中国问题。讨论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16至19世纪,讨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明清两代,这一视野尤为重要。

为什么从16世纪开始,中国的海外贸易既出现了大发展又出现了种种矛盾冲突?这些现象既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自身的原因,又与世界社会经济向近代转型诸多事件相关联,这是海外贸易的海洋经济属性所决定的。传统的内陆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约束受到近代世界市场拉力作用的海洋生产方式的蓬勃活力,而世界社会经济中的海洋经济由于地理的大发现,由于洲际间经济体系的开始形成,进入了全球发展阶段。无论中国的内陆文明愿意不愿意,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已经被纳入到世界海洋经济和全球性的市场之中。“1500年以前,文明基本上以大陆为中心,海上联系,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假如把1500年作为划分世界历史新时期的标志,这是因为从这时起,在各个大陆间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这样就不仅把历史舞

台扩大到在此以前仍与世隔绝的地区，而且导致向欧亚大陆中心平衡进行挑战。”“随着18世纪历史的前进，一个广泛的世界贸易网发展起来。”⁷

“要立足现实，面对历史，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理所当然地把重点放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上，即明清以来海洋社会经济变迁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上。”“它的创意，在于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既有的基础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⁸我们必须跳出从中国看中国和从内陆看中国的传统学术思维，立足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层面上，从海洋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加之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从现有的与海外贸易研究相关的诸学科的成果中发展起来，以克服过去史学研究中的疏漏，解决以往研究留存下来的未能解决的问题和还未涉及的问题。

本书将努力尝试这一工作，并力图在下述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有突破性的探索：

本书的主题是“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时间主要限定在具有分析意义的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讨论的内容属于中外海上贸易的范畴，但并不是分别讨论商人问题或海外贸易问题、市场问题，不是对中外海上贸易作一般的经济的描述，而是重在探讨这种贸易中的商人与市场的关系，把当时活跃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商人与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纳入到海洋社会经济的视野进行考察分析。

发生在当时的中外贸易并不只是一方需要另一

方的问题,而商人趋利,中外皆如此。世界需要中国的商品,中国需要外国的白银。当趋利的西方人把近代世界市场推进到中国的大门口时,同样趋利的中国东南商人立即与其发生了以谋利为动机的交易行为,其结果给双方带来推动作用,即互动,使双方获利,并又开始了下一轮的互动。因此,东南商人与近代世界市场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为前提的互动、互动中实现互利的互动关系,而本书的学术目标就确定在东南商人参与这种互动的研究上。要实现这一学术目标,必然要讨论到互动的历史过程即中外贸易史、关系史,讨论到互动中的物质条件即市场构成、商路网络,讨论到东南商人的互动行为,讨论到控制商人行为的观念意识、习俗制度等问题。因此,本书试图从这些方面来构建全书的分析框架,讨论这种互动的问题。全书由这么几个部分组成:一,近代世界市场对中国东南市场的拉力;二,东南市场的构成、扩张力和贸易带;三,贸易带上的互动行为;四,对商人互动行为具有控制作用的东南商人社会;五,对商人互动行为具有控制作用的政府选择行为;六,对东南商人互动行为的历史评价。这样的讨论内容就不是仅仅只从商人,或只从中外贸易,或只从市场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能容纳得了解决得了的,需要整合有关若干学科考察分析。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书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以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视野来观照考察分析对象。本书需要“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经济史、

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理所当然地被本书整合进来,其中包括商业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交通史;海洋社会文化深层的内容,如海商社会及其风俗、海商心态及其精神意识等这些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研究的范畴,为了深入探讨商人的需要,也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为了更好地运用“科际整合”,对现代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采取了积极吸收、利用的态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及其相关材料、制度经济学派理论中有关制度与行为关系的理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也作为分析的工具和理论武器予以借鉴。

本书在准备资料时,不仅查阅了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如《明实录》、《清实录》、《东华录》、《大明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等;更考察了中外保存的大量明清档案史料、文集、方志、笔记、小说、族谱、碑刻、商人文书、商路图引、海道针经,如《明清史料》、《明清档案(内阁档案)》、《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史料旬刊》、《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名山藏》、《景璧集》以及英国国家档案局所藏嘉庆年间广东十三行商人文书⁹等。另外,近三四年来,我利用机会对大运河—赣江一线和东南沿海一线部分地区作了实地考察和访问调查工作。

“还原”历史、“复忆”历史是一项需要许许多多研究者前赴后继来完成的大工程,我愿成为其中的

一员。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内容深广丰富。商人互动行为并不是海洋社会经济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商人活动的所有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本书确立的首要学术目标正是对此部分作“还原”“复忆”。

三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我的本科与硕士阶段学的是中国文学和汉语史,虽然在后来的教学科研中学习并借鉴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但自感史学功底浅薄;而过去一直生活在内陆,体悟不到海洋的内蕴。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我在导师杨国楨先生指导下,不仅翻阅了大量的各种史料,学习了史学研究方法,检索了有关研究信息,选择了这一课题,也开始体悟到海洋的广袤和深邃,逐渐领会建设海洋社会经济史学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我庆幸成为这个学术群体的一员,做了一份微薄的工作。

今日,我谨以拙书向各位学术前辈和广大读者请教之时,衷心感谢师友们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致读者